

Doi:10.20063/j.cnki.CN37-1452/C.2024.06.004

普通话词语的外向传播与华语融合

——基于《全球华语大词典》的调查

刘燕婧

(北京师范大学 文学院,北京 100875)

摘要:通过定量与定性相结合、描写与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从普通话外向传播的角度出发,可以发现《全球华语大词典》C字母下149个使用地区标记为“用于大陆等地”的词语在马来西亚华语中的融合情况大致经历了借用、自用或化用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各具特点,彼此之间的关系不尽相同。当前全球华语融合已经进入以普通话输出为主的阶段,普通话视角在今后华语融合研究中的重要性十分显著。

关键词:普通话;外向传播;马来西亚华语;华语融合

中图分类号:H10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8039(2024)06-0031-08

一、引言

本文所说的“华语融合”,主要是指“当今华语圈向普通话圈靠拢,及其由此而产生的趋同化表现”^[1]。在以往的华语本体研究中,人们几乎都把精力集中在“找差异、明特点”,即描写、分析与解释各地华语与普通话的差异,由此总结归纳华语的特点。这样的研究固然非常重要,并且以往在三个“充分”(即充分观察、充分描写与充分解释)方面做得还远远不够,因此还应不断拓展与深化。但是,从根本上说,这是着眼于“过去”,如今全球华语融合的时代已经到来,相关的认识也已经在研究中有所体现。比如,汤志祥明确指出,“我们迎来了一个可以称之为全球华语大发展、大融合、大变化的时代”^[2];周清海将改革开放之后至今的这段时期称之为“现代汉语的融合阶段”^[3],前不久又指出“汉语(按,这里指的应是‘全球华语’)的大融合是当前现代汉语和国语/华语的现状”^[4];游汝杰也认为,“世界各地华语差异逐渐缩小,有互相融合的趋势”^[5]。由此可见,全球华语进入融合阶段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成为学界共识,因此,在加强普通话与华语差异研究的同时,应当尽快实现重心转移,将更多的精力用

于对华语融合的研究上。

关于全球华语具体语言事实融合的相关研究成果,刁晏斌从“部分融合”与“整体融合”两个阶段进行了系统的梳理,指出,“总的看来,华语整体融合的研究还处于‘初级’阶段,这一状况与当前华语以及华语研究的迅速发展是极不相称的,因此亟待加强”^[6]。在此之后,刁晏斌着眼于普通话的“输入”,考察了《马来西亚华语特有词语词典》B字母下161个词语在普通话中的“输入”情况^[7],又以普通话“关怀”一词基本用法的变化为例,指出普通话与国语/华语圈正在由差异走向融合^[8];立足于普通话的“输出”,刁晏斌、刘燕婧调查了2021年度十大新词语和十大网络用语在11个地区和国家华文媒体的使用情况^[9],刁晏斌对普通话时政词语、日常词语、网络词语等类别词语的外向传播状况及其一般表现进行了举例说明^[1],还研究了“闺密/蜜”一词在全球范围内的传播与扩散^[10]。

即便如此,立足于华语融合的实证研究还远远不够,“华语融合第一阶段(按,即普通话的输入阶段)研究还需要大量‘补课’,以弥补以往研究的不足;此外,还应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从事第二阶段(按,即普通话的输出阶段)事实的调查梳

收稿日期:2023-11-05

基金项目:国家语委“十四五”科研规划重点项目“香港地区中文书面语发展研究”(ZDI145-39)

作者简介:刘燕婧(1997—),女,江西赣州人,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

文章撰写过程中得到了刁晏斌教授的精心指导,在此表示诚挚的谢意。同时,感谢匿名审稿专家的宝贵意见。如果文章中存在任何错误或不足之处,概由本人负责。

理和解释说明,以便更好地了解华语当下的实时状况及其进一步的发展方向 and 路径”^[1]。有鉴于此,本文立足于普通话的外向传播,以《全球华语大词典》(下简称《华语》)中C字母下所有标注“用于大陆等地”的149个词语为研究对象,逐一考察其在马来西亚华语星洲网(2007—2023年)中的具体使用情况,以此了解上述词语的输出现状及其表现。本文所说的“有”和“无”以及词语融合所处的“借用、自用、化用”三个阶段,是就指定调查范围之内而言的,至于这一范围之外,可能会有一些参互异同,所以调查结果只有相对性而没有绝对性^①。

二、普通话词语的外向传播调查

《华语》C字母下标注“用于大陆等地”的词语(下文简称为“普通话词语”)总计149个。根据检索,这些词语在星洲网中出现的数量为112个,占比75.17%;尚未出现的词语共计37个,占比24.83%。

对于已经出现在星洲网的112个词语,本文进一步考察其所到达的融合阶段,并将其由高划分为“借用、自用和化用”^[11]三个阶段。考察结果如表1所示。

表1 《华语》C字母下的普通话词语在马来西亚华语中的融合阶段

融合阶段	普通话词语	数量
借用	财产保全、财产性收入、采摘游、彩棉、菜篮子(借指城镇的肉菜等副食品供应)、查铺、查体、长江经济带、长江学者、长三角、长征(特指中国工农红军1934—1936年由长江南北各苏区向陕甘苏区的战略转移)、肠梗阻、超编、超采、超生(指超出规定的计划生育指标而生育)、超声速、炒买炒卖、车补、车次、陈化粮、成人高考、成人节、城徽、乘警、吃皇粮、吃拿卡要、吃子孙饭、持证上岗、臭老九、处警、传帮带、传达(在机关、学校、工厂等门口负责看门、收邮件和来宾登记、引导等,也指做这种工作的人)、传达室、串案、窗口行业、吹风(有意识地从侧面透露消息使人知道)、春运、错层	38
自用	财报、彩超、彩民、彩信、参军、参政议政、草坪葬、残效、插队落户、插件(装有电子器件并可插入计算机插槽的电路板,如显示卡等)、茶话会、察看(对犯错误者的一种处分,把他留在组织或单位内,考察是否改正错误)、差生、差旅、差旅费、产褥感染、产褥期、铲车、长考、长线(较长时间才能产生效益的)、唱空、超购、超文本、朝天椒、潮物、车标、车企、车贴(车补)、城管、城际、城际铁路、城市雕塑、城市规划、城市牛皮癣、城市铁路、城镇化、城中村、吃喝风、吃回扣、吃青春饭、持仓、持仓量、赤脚医生、冲金、冲压、筹划、出场费、出租车、处理(用特定的方法加工)、处子秀、触摸屏、船台、创客、创业园、磁卡、磁疗、粗放、余汤、催化剂、村官、存储器、错峰	62
化用	擦边球、菜品、草食男、车况、车友、尘肺、仇富、创口贴、创收、春晚、磁盘、脆性	12

从表1可知,在马来西亚华语中,进入自用阶段的普通话词语数量最多,共计62个,占比55.36%;借用阶段的词语数量次之,共有38个,占比33.93%;达到化用阶段的词语数量最少,只有12个,占比10.71%。下面就这些词语在这三个阶段的不同表现进行描写与分析。

(一)借用

“借用”就是连同普通话语境一同“打包”引进,既包括整个语篇或语段的“直接引用”,也包括做出某些修改或调整以及介绍性的“间接引用”^[9]。普通话词语在马来西亚华语中处于借用阶段时的具体表现呈现出以下几个特点。

1.使用频率整体偏低。本文参照刁晏斌^[7]对马来西亚华语词语在普通话中具体使用频率的划分,将普通话词语在马来西亚华语中的出现次数分为偶用(10次以下)、次偶用(10次以上100次

以下)、次常用(100次以上1000次以下)和常用(1000以上)四个等级。统计结果显示,偶用、次偶用、次常用和常用的词语数量分别为18个、10个、6个和4个^②。如果按“偶用”(包括偶用和次偶用)与“常用”(包括次常用和常用)两个层次进行划分和对比,则二者比例为28:10;在38个词语中分别占比73.68%和26.32%。可见,处于借用阶段的词语使用频率总体偏低。

2.通常带有显性的借用标记,这些标记往往出现在新闻的标题、抬头或正文中。例如:

^①本文引用的所有例句均源自马来西亚华文媒体平台星洲网(<https://www.sinchew.com.my>),具体时间跨度为2007年8月27日至2024年1月15日。

^②在上述统计中,有些词语存在不符合条件的用例,如“查体”和“长征”等。因此,实际上偶用的与常用的借用词语数量相差更为悬殊,以下自用和化用阶段词语的使用频率也是如此。

(1)这是去年一场天然彩棉代言签约仪式会后的庆功,在上海浦东某五星级大饭店内举行,厂商老板及老板夫人、小孩、工作人员和萧蔷经纪人 Timmy 都在场(2007-10-21)

(2)《习近平:扎实推动共同富裕 城乡居民住房等各类财产性收入》(2021-10-26)

在上述例句中,例(1)和例(2)的文头分别标有“上海讯”“北京 16 日综合电”,内容包含“上海浦东”“习近平”,这些均为词语处于借用阶段的显性标记。

有一些词语出现在马来西亚当地的报道中,但是内容与中国大陆紧密相关,这类情况属于介于借用与自用之间的过渡阶段。例如:

(3)现今陈思和是中国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曾获上海哲学社会科学优秀学术成果一等奖。(2013-07-05)

此例的抬头是“吉隆坡 5 日讯”,但是“长江学者”的修饰语为“中国教育部”,并且文章标题为“中国文坛重量级学者.陈思和黄子平出席花踪”。所以,此例与马来西亚相关,同时尚未完全脱离中国大陆语境,因而属于介于借用和自用之间过渡阶段的用例。

3.可以分为直接借用和间接借用两种类型。“直接借用”就是直接借自中国大陆媒体的借用;“间接借用”则为借自中国大陆以外其他地区媒体的借用,其来源有时可能不止一个^[9]。处于借用阶段的普通话词语可以依此细分为以下三类。

一是只有直接借用实例的词语,如“财产性收入、采摘游、彩棉、查铺、陈化粮、吃皇粮、吃拿卡要、串案、窗口行业”等,略举用例如下:

(4)为避免发生重大安全事故,核电站在中国最多只能搞 50 多座,内陆绝对不可以建,那个要求在 2050 年建 400 座的规划,更是太危险太疯狂了,那是吃子孙饭啊!(2016-08-15)

(5)皮志贤等经调查后向有关部门举报,该粮库遭垫江县工商局查获陈化粮 1 千多吨,罚款 100 多万元人民币(约 46 万 3 千令吉),处理违纪人员 12 人。(2011-01-04)

二是兼有直接借用和间接借用例句的词语,

如“财产保全”“炒买炒卖”“传帮带”“错层”“持证上岗”等,其间接借自其他华语社区的用例如下:

(6)“五星巴西”主帅邓加昨日在接受巴西媒体采访时表示,现在的巴西队太过依赖内马尔,缺少“9 号”中锋,而他也希望像罗比尼奥这样经验丰富的老将,可以更多地在球队起到“传帮带”的作用。(2015-03-17)

(7)台湾建筑师曹登贵在“脸书”发文“关于保丽龙块、沙拉油罐、135 度箍筋与错层搭接”,提出 4 点说明,希望可以¹⁰让民众有较正确的工程常识。(2016-02-10)

上述例句中,例(6)的标题为《邓加:巴西太依赖内马尔》,抬头标有“巴西.里约热内卢 17 日讯”,例(7)引用台湾建筑师的文章,可见此二例分别借自巴西和中国台湾。

三是只有间接借用例句的词语,这可能与语料范围有限或词语使用频率较低有关,如“成人高考、成人节”等:

(8)诉状中称,为了报考福冈女子大学“饮食与健康专业”2015 年度入学考试中的成人高考,本月向大学提交了申请书,而校方以“申请资格要求是女性,自办学以来,我校一贯坚持女子的大学教育,不会改变这一方针”为由,决定不予受理。(2014-11-16)

(9)对于动漫节被批评为“成人节”,梁佑嘉希望家长能给小朋友正面信息,知道一众姐姐为工作才性感示人。(2011-07-31)

在星洲网中,“成人高考”只有 1 个用例,带有日本背景;“成人节”共有 11 个有效用例,均间接借用自日本和中国香港。

上述间接借自其他华语社区的例句,有些能在其来源社区找到高度相似的用例。比如,例(7)与中国台湾风传媒网络新闻媒体 2016 年 2 月 6 日的报道《梁柱用沙拉油桶、保丽龙是偷工减料? 建筑师:有些是合理工法,不宜未审先判》(例(10))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并且前者略晚于后者,由此可以合理推断前者来源于后者。又如,例(9)与中国香港《星岛日报》2011 年 7 月 30 日的《梁佑嘉不敢火并性感女》报道内容(例(11))存

在一定的相似性。

(10) 建筑师曹登贵在脸书发文“关于保丽龙块、色拉油桶、135度箍筋与错层搭接”,列出4点“厘清几个工程上经常被误解的事情”,表示希望可以借此减少非建筑工程专业的朋友过度紧张恐慌,有较正确的工程常识。(2016-02-06)

(11) 对于外界指Cosplay女郎太性感,令动漫节变成犹如“成人节”,佑嘉表示:“所以要有家长同行作出正确指引”。(2011-07-30)

(二) 自用

“自用”是指脱离了来源语境的自主性使用,此时某词语涉及的施、受主体以及关涉对象等均为“己方”的人或事,并且借用时的一些“显性”标记多数已经不复存在。这是普通话词语融入马来西亚华语词汇系统的“初级”表现,属于融合的“进阶”阶段^[9]。普通话词语在马来西亚华语中处于自用阶段的表现具有如下几个特点。

1. 使用频率相对较高。星洲网中处于自用阶段的普通话词语,出现次数为偶用、次偶用、次常用、常用的分别有12个、26个、15个和9个。按“偶用”(包括偶用和次偶用)与“常用”(包括次常用和常用)两个层次划分和对比,则二者比例为38:24;在62个词语中分别占比61.29%和38.71%。与上文处于借用阶段的普通话词语的偶用(73.68%)与常用(26.32%)比例相比较,自用阶段的偶用词语数量更少,常用词语数量更多。

2. 通常带有显性的自用标记。自用阶段的显性标记与借用阶段有所不同,前者报道马来西亚当地的事件,后者则是与中国大陆有关的新闻。

(12) 《老华商看新山有感而发 完善城市规划不可或缺》(2007-10-06)

(13) 马华总会长拿督斯里廖中莱说,马华积极推动华人新村的转型计划,包括在新村制造更多经济平台,把新村城镇化,以留住年轻人及人才。(2015-03-16)

在以上例句中,例(12)的标题出现“老华商”“新山”,其正文抬头标有“新山讯”;例(13)抬头为“吉隆坡15日讯”,正文出现“马华总会长拿督斯里”。这些都是普通话词语在马来西亚华语中自行使用的显性标记。

3. 进入自用阶段的词语,其借用的途径也相对更加广泛。一个词语的借用途径更加广泛,意味着它的使用地区范围更加广阔,为更多地区的人所熟知并运用,因而融合程度也会有所提升。下面以“差旅费”为例进行说明:

(14) 国行宣布的第四项新措施则是放宽国内马币贷款定义,即公司充作“杂项开支”(miscellaneous expenses)的马币贷款便利将不再计入国内马币贷款,包括各种杂费和雇员差旅费等。(2019-08-16)

(15) 此外,发展拨款也用于支付如基础设施费用和差旅费之类的运营费用。(2020-12-10)

以上两例为“差旅费”在马来西亚华语中的自用例句,其抬头分别标有“吉隆坡16日讯”和“吉隆坡10日讯”。同时,该词也存在借自中国大陆、英国、美国纽约和新加坡等地的例句。以下两例分别与英国和新加坡有关:

(16) 英格兰主帅霍奇森和英足总改主意,他们不允许太太团随队出征巴西世界杯。世界杯之前的美国拉练,英足总也不准备为家眷支付差旅费。(2014-05-16)

(17) 为了节约来回差旅费,父亲一年都回来不到一次,总想着,等我们长大了,父亲就可以歇歇了。(2020-06-10)

(三) 化用

“化用”是指在自用阶段的基础上,引进词语在意义以及用法等方面的变化性使用,相对于“源词语”而言,这是多出的部分,也就是在其“本义”“本用”之外新的发展变化,这是词语融合的较高级阶段和层级^[9]。

马来西亚华语中进入化用阶段的普通话词语为数不多,仅有12个。这些词语从出现频次来看,总体不是很高。其中,次偶用、次常用和常用的词语数量分别为7个、4个、1个。

就化用表现而言,大致可以分为用法变化和意义变化两类,前者如“擦边球”“草食男”“仇富”,后者如“车况”“车友”“尘肺”“菜品”“创收”“春晚”“磁盘”。下面分别以“擦边球”和“春晚”为例,对普通话词语在马来西亚华语中的用法变化和意义变化情况进行分析。

“擦边球”在《华语》中的释义为“打乒乓球时

擦着球台边沿落下的球。后来把有意做接近违规或违法而不违规或违法的事比喻为打擦边球”^{[12][134]},与《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下简称《现汉》)基本一致,后者标注该词的词性为名词。

在星洲网中,该词最初主要分布于借自其他地区的报道中。比如,以下两例分别借自中国大陆和新加坡:

(18)厉明也指出,其他香烟品牌也使用类似的“擦边球”广告,诸如安徽省蚌埠黄山的黄山牌香烟的“一品黄山,天高云淡”,以及湖南省长沙景点白沙的白沙牌香烟的“鹤舞白沙我心飞翔”。^①(2009-01-24)

(19)他是提供各种咨询的顾问、前阿窿或投资金主,精通阿窿运作,熟悉法律细节,最擅长打法律擦边球。(2009-11-10)

在本文所检索到的用例中,“擦边球”似乎没有经过自用阶段,而是直接“跨越”进入化用阶段,以下是其首个化用例句:

(20)或许现在才来研究,已经迟了,但至少回应选民的渴求,不要再擦边球、存侥幸心理。(2011-04-14)

此句标题为《林瑞源.砂州华裔要什么?》^②,显然是马来西亚当地背景,而“擦边球”在这里用作动词,以副词“再”修饰,并且与动词性词组“存侥幸心理”并列,因此属于用法上的化用。这样的用例再如:

(21)而国阵华基政党以巫统的立场为依归,只能擦边球,比如淡化吉隆坡无法举办啤酒节的事实,大力抨击雪州啤酒节偷换概念;行动党则为了华裔选票,大谈公开喝酒吃猪肉。(2017-09-30)

(22)行动党在华教课题上应拿出确实证据展开理性辩论,而不是一再在外“擦边球”,不愿正面回应课题,企图模糊焦点。(2022-03-03)

“擦边球”在上述例句中作为动词,分别位于能愿动词“能”和副词“一再”之后,均表现了用法上的变化,这在普通话中未曾出现。

“擦边球”的自用例句是在化用实例之后出现的:

(23)不过,只要是和首长继承人扯

上关系的,那怕只是一个“擦边球”而已,也同样会引起各界注视。(2012-05-25)

(24)以娱乐化来转移政治课题,也许是媒体在言论受限时惯用的擦边球,但能够对娱乐和新闻拿捏得准的媒体人毕竟可遇不可求。(2014-04-05)

“春晚”在《现汉》的释义为“[名]春节联欢晚会的简称。特指中央电视台举办的春节联欢晚会”;《华语》的释义更加简单:“春节联欢晚会。”在本文的语料范围内,该词的最早用例如下:

(25)往中国发展的大马歌手当中,阿牛的成绩最标青,他在中国的活动常做常有,歌曲也受大家喜爱,就连央视春晚都盛邀他任表演嘉宾。(2007-08-30)

此例抬头标注“八打灵再也讯”,例句内容与当地华人歌手有关,同时尚未脱离中国大陆语境,因此属于介于借用与自用之间过渡阶段的例句。

以下这一例则完全在马来西亚语境中自行使用:

(26)《家娱户晓迎新岁 2012》春晚。温力铭拟自创饶舌新年歌(2011-12-14)

该例句源自马来西亚雪兰莪八打灵再也的报道,其正文有更为详细的介绍:“为迎接明年华人农历新年,Astro家娱频道主办、IPC荣誉呈献《家娱户晓迎新岁 2012》新春晚会,于1月7日(星期六)晚上8时正,在云顶云星剧场举行,并邀得2位‘国宝级’歌手——情歌王子光良及马来乐坛天后茜拉玛吉(Sheila Majid)压阵。”可见,标题中的“春晚”与正文的“新春晚会”所指相同,因此已然进入自用阶段。

在例(25)和例(26)之间,也存在与中国大陆、台湾、香港等地区有关的用例,但是例句中的“春晚”都特指“中央电视台举办的春节联欢晚会”。例如:

(27)年年备受瞩目的2009年央视春晚本周将举行三审,而歌舞类节目已经在8日完成三审。(2008-12-11)

(28)魔术师刘谦在央视春晚暴红,

^①原文如此,笔者照录。

^②此处标题中下标隔点为马来西亚自有标识,笔者照录。以下例文中此种标识皆为此情况,并非误用。

造成中国魔术热潮,而一出道即展现魔术天份的周杰伦(周董),早前在中国节目透露要把魔术搬上银幕,与刘德华(华仔)在《不能说的秘密2》中PK魔术。(2009-02-01)

(29)《香港首位.容祖儿连续4年央视春晚献唱》(2010-01-20)

在马来西亚华语中,“春晚”意义发生变化的最早用例如下:

(30)《叻龙中公校友会2012壬辰龙年春晚.27日天阁酒楼举行》(2012-01-12)

此例的正文出现“届时、将邀请工程部副部长拿督杨昆贤为晚会主宾”和“晚宴筹委会阵容”,因而“春晚”不仅指晚会,还表示晚宴。类似的用例再如:

(31)这一春晚,在爆竹万响与烟花绽放下,99尺祥龙和首席财神齐来报禧派财,欢乐盈满威中柔府村,全村的乡亲乐开怀,热哄哄沸腾舞动。(2012-01-17)

该例的正文包括歌舞节目和新春晚宴,显然这里的“春晚”也包括晚会和晚宴,因此其意义也有所泛化。

三、相关的认识与思考

以上立足于普通话的外向传播,从借用、自用和化用三个阶段对已经进入或融入马来西亚华语的普通话词语进行了初步调查,由此得到以下四点认识。

首先,普通话词语在马来西亚华语中的不同融合阶段具有不同的表现。其中,处于借用阶段的词语使用频率总体偏低,并往往带有显性的借用标记;借途径包括直接借用和间接借用两种渠道,并且间接借用的来源可能不止一个;借用的方式包括直接引用和间接引用两种类型。进入自用阶段的词语,其使用频率相对较高,并且通常带有显性的自用标记,此外,这些词语间接借用的来源要比处于借用阶段的来源更加多元。到达化用阶段的词语,虽然出现频次整体不高,但是意义或用法等方面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变化。

其次,对融合程度由浅至深的借用、自用和化用三个阶段有以下几点更加深入的认识。第一,这三个阶段并非后一阶段取代前一阶段的关系,

而是在前一阶段的基础上增加了后一阶段的用例。换言之,当词语在马来西亚华语中已经进入自用阶段之后,仍然会持续援引其他地区含有这些词语的报道,所以还会有新的借用例句;同样,当进入化用阶段之后,借用和自用的过程还在持续。第二,这三个阶段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具体而言,某些词语在某个华语社区中的自用例句或化用例句,进入另外一个华语社区的媒体平台之后,在另外的这个华语变体中就属于借用例句,如上引例(17)是新加坡华语“差旅费”的自用例句,但是在马来西亚华语中则是借用用例。第三,不仅借用、自用和化用三个阶段之间的融合程度存在差异,同一阶段的不同词语之间的融合程度也有所不同,这种不同在借用阶段表现为借用频率的高与低、借用来源的丰富程度;在自用阶段体现在词语总体使用数量的多与少、自用例句数量占比的高与低等方面;在化用阶段则表现为词语意义、用法等发生变化的用例数量占比,以及产生变化的意义和用法与原义、原用法的“偏离”程度等方面。

再次,时至今日,华语融合确实已经进入以普通话外向传播为主的阶段^[1]。根据上文统计,普通话词语的输出比例较高,达到75.17%。在输出的词语中,以处于自用阶段的词语数量最多,为62个,占已输出词语的55.36%;借用阶段的词语数量次之,共计38个,占比33.93%;化用阶段的词语最少,共12个,占比10.71%。通过对比该考察结果与上引刁晏斌^[7]的调查,可以发现普通话词语输出至马来西亚华语的比例(75.17%)要高于普通话输入的马来西亚华语特有词比例(59.62%),这在一定程度上验证了“1982年至今为‘向普通话趋同时期’”^[13]“现代汉语的输入局面正在逐渐转为向华语输出”^[14]等观点。对于普通话词语“融入”(即进入“自用”和“化用”阶段)马来西亚华语的占比(66.07%)低于马来西亚华语特有词“融入”普通话的比例(86.5%),则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加以解释。第一,与《马来西亚华语特有词语词典》中“特有词语”的内涵和外延有关。这部词典收录的是马来西亚华语或其与其他社区华语共有的词语,如“巴士”也为《时代新加坡特有词语词典》《香港社区词词典》收录,而本文所选取的词仅限于标注为“用于大陆等地”。因此,马来西亚华语词语融入普通话的渠道更加多元且直接,即可以由马来西亚华语、新加坡华语

和香港“国语”等多个华语变体直接作用于普通话,而普通话融入马来西亚华语的渠道则虽然多元,但是直接的途径更少,即普通话是直接影响因素,新加坡华语、港澳台“国语”等都是间接影响因素,因此融入的比例相对较低。第二,与普通话外向传播时间较短因而融合程度相对较低有关。“普通话输入为主的阶段”早于“普通话输出为主的阶段”,所以很多普通话输入的词语经历了较长的发展阶段,发展得相对更为成熟与完备,趋近于或处于“已经完成融合”的状态;反观普通话输出的词语,由于刚输出不久,因此较多处于“刚开始融合”的阶段,还有进一步发展及融合的可能性。刁晏斌指出,普通话圈向国语/华语圈的靠拢基本属于“完成时”,经历了一个大规模的比较集中与充分的引进阶段,现在这一过程已经趋于结束,剩下的只有一些零星的吸收;国语/华语圈向普通话圈靠拢,则还属于“进行时”,尚处于进一步的发展过程中,均未达到上述的集中与充分,还有很大的上升空间,因而总体上国语/华语圈的融合度要高于普通话圈^{[15]347}。

最后,普通话在全球华语融合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华语融合研究需要注重“普”角(即普通话视角)的运用,以便更好地理解华语的发展趋势和方向,进一步推动华语研究的深入发展。“普”角在华语差异研究中的重要性已经不言而喻,比如在实证研究层面,现有成果大多数都是以普通话为视角来观察华语,对比、寻找其中的异同,然后对这些不同的形式、意义或用法进行讨论和分析;在理论探索层面,李计伟^[16]首次将邢福义^[17]提出的“普、方、古”三个视角引入华语研究时,就已经强调了普通话视角的重要性,在此基础上发展而来的“普、方、古、外”四角^[18-19]、“普、方、古、外、国”五角^[20],以及最新的认识“华、国、方、外、普、古”六角^[21],都将“普”角列为华语研究非常重要的视角。其实,普通话在华语融合过程中的重要性也不容忽视,比如以上研究证明了华语融合已经处于“普通话输出为主的阶段”;刁晏斌指出“普通话圈不断地外向扩大,对全球华语的影响越来越大”^{[15]327},讨论了普通话的外向传播与全球华语融合之间具有的直接因果关系^[1],刁晏斌、刘燕婧的调查结果表明普通话词语在国语/华语圈中有较高的融合度^[9]。由此可见,普通话作为全球华语融合的重要推动力量,其传播和使用对于华语的发展和演变具有深远的

影响。因此,华语融合研究需要从“普”角出发,以此深入探讨融合的规律和趋势。

本文由普通话外向传播的角度切入,从借用、自用和化用三个阶段,对《华语》C字母下149个使用地区标记为“用于大陆等地”的词语在马来西亚华语中的融合情况进行了深入考察。在此基础上,对三个阶段的特点及其相互关系进行归纳总结,并且验证了当前全球华语融合已经进入以普通话输出为主的阶段这一重要结论,由此强调“普”角在今后华语融合研究中的重要性。本文的研究成果不仅丰富了全球华语融合的研究内容,也对融合研究的视角问题进行了初步探讨,这将有助于推动全球华语研究的深入发展。

参考文献:

- [1] 刁晏斌.普通话的外向传播与华语融合:事实与思考[J].语言文字应用,2023(2).
- [2] 汤志祥.中国大陆主体华语吸收海外华语词语的层级、类别及其比例的考察[M]//海峡两岸现代汉语研究.香港:文化教育出版社,2009.
- [3] 周清海.“大华语”的研究和发展趋势[J].汉语学报,2016(1).
- [4] 周清海.从“大华语”的角度谈语言融合、语文政治化与语文教学[J].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3).
- [5] 游汝杰.汉语研究的当代观和全球观[J].语言战略研究,2021(3).
- [6] 刁晏斌.华语融合研究回顾与前瞻[J].长江学术,2023(4).
- [7] 刁晏斌.普通话的“输入”与全球华语的融合——基于《马来西亚华语特有词语词典》的调查[J].Global Chinese(《全球华语》),2022(2).
- [8] 刁晏斌.“立地+顶天”:全球华语研究的学术愿景与追求[J].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1).
- [9] 刁晏斌,刘燕婧.立足于普通话“输出”的全球华语融合现状调查——以2021年度十大新词语和网络用语为例[J].励耘语言学刊,2022(2).
- [10] 刁晏斌.普通话的外向“输出”与全球华语的融合——以“闺蜜/蜜”一词的传播与扩散为例[J].杭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2).
- [11] 刁晏斌.大陆词语在台湾:从“进入”到“融入”[N].光明日报,2016-05-29.
- [12] 李宇明.全球华语大词典[Z].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
- [13] 潘碧丝.马来西亚华语词汇与普通话词汇差异及其协调发展[D].北京:首都师范大学,2007.

[14]周清海.“大华语”与语言研究[J].汉语学报,2017(2).

[15]刁晏斌.全球华语的理论建构与实证研究[M].北京:华语教学出版社,2018.

[16]李计伟.“两个三角”理论与海外华语语法特点的发掘[J].汉语学报,2012(3).

[17]邢福义.现代汉语语法研究的两个“三角”[J].云梦学刊,1990(1).

[18]田小琳.“普一方一古一外”的比较原则在现代

汉语词汇教学中之应用[C]//全国高校现代汉语教学研究会第十六届学术研讨会论文.贵阳:2018.

[19]王晓梅.“普、方、古、外”——论全球华语研究的四个视角[J].Global Chinese(《全球华语》),2019(1).

[20]刁晏斌.华语研究方法论的探索与思考[J].华文教学与研究,2022(3).

[21]刁晏斌.论华语研究的六个视角[J].民俗典籍文字研究,2022(2).

Outward Communication of Putonghua Words and the Integration of Huayu: Survey Based on *Global Chinese Dictionary*

LIU Yanjing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 China)

Abstract: By way of a research method of the quantitative and qualitative combination and the descriptive and analytical one, an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outward communication of putonghua, it is found that there are roughly three stages (borrowing, self-usage and domestication) in the integration of 149 words marked as “used in Chinese mainland, etc.” under letter C of *Global Chinese Dictionary* in Malaysian huayu. The three stages have their own distinctive features and different relationships. At present, the integration of global huayu has entered a phase mainly dominated by the output of putonghua, and the importance of putonghua perspective is very remarkable in the future research on the huayu integration.

Key words: putonghua; outward communication; Malaysian huayu; huayu integration

(责任编辑 雪箫)